



ZHONGYING WENXUE GUANXISHI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

 吴格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

吴格非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 / 吴格非著. —徐州: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646 - 0641 - 1

I. ①1… II. ①吴… III. ①文学—文化交流—文化
史—中国、英国—1848~1949 IV. ①H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9733 号

书 名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

著 者 吴格非

责任编辑 万士才 於娟娟

责任校对 孙 景

出版发行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江苏省徐州市解放南路 邮编 221008)

营销热线 (0516)83885307 83884995

网 址 <http://www.cumtp.com> **E-mail:** cumtpvip@cumtp.com

排 版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排版中心

印 刷 徐州中矿大印发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5 **字数** 292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一

吴格非教授请我为他的新著《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作序,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是近几年的热门课题。上海三联书店于2004年出版了葛桂录博士的《中英文学关系编年史》,它从宏观上讨论了中国文学在英国的流播与评价、英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与评价、英国作家笔下的中国题材以及中国作家笔下的英国形象等。其实,在很多诸如中国比较文学史等相关的著作中,都会提到中英文学关系研究的情况,例如:王向远教授在2007年出版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第六章专门用一节来讨论中英文学关系的问题。可见,这一课题是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

中英文学关系史的研究具有几个显著特点:动态性、立体性和双向性。动态性强调的是文学、文化在历史发展当中的多样化;立体性强调的是不同国家、地区的民族创造的文明、文化如同人类社会本身一样,都处在一种网络式的结构之中,所以中英文学之间的交流自然也是立体网络式的;双向性强调的是文学交流时的双向互动,以避免片面、偏执和主观性。吴格非教授的新著《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从文学、文化、翻译等交流、互动、吸收的视角,比较好地体现出了这几个特点。

对文献资料的搜罗、梳理、甄别和选择是一件十分费时费力但又颇见功底的事情,也一直是我国先辈学者治学的优良传统。

《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属于史的范畴,而坚实的史料是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意义和价值大小的决定因素。吴格非教授在剑桥大学访学时,经常出入图书馆,为这本书的写作收集了丰富的史料。然而,史料并不等于历史,就好像布帛不等于衣服、砖瓦不等于房屋一样。《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是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整理、加工、撰写的,而作者的思想、观点和意识就在整理、加工和撰写的过程中把中英那一百年间大量原本纷乱繁杂的文学或文化的交流史料逐渐形成了一条清晰、明了的线索,使这一中英文学关系断代史的学术研究颇具科学性和实证性,为其他研究者进一步探讨这一段时期的中英文学关系史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平台。

吴格非教授是一名知识渊博并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人文学者,他的这本书里有不少的亮点和闪光之处。我衷心期望他继续努力,使中英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为更多的读者所了解和接受。

曹山柯

2010年5月于广州

序二

吴格非教授的《1848~1949 中英文学关系史》一书即将出版，承蒙吴君邀请，要我为他的大作作序，盛情难却，而我却总觉手拙思竭，一直踌躇。

我跟吴君首次见面还是在上一世纪 90 年代，吴君儒雅的风度和书卷气、良好的家学渊源、深厚的中英语言文学功底、对事业的执著一下子就使我们相见如故，有了很多相同的话题，互相交心。之后吴君在学术道路上勤奋刻苦、慷慨激昂，不断有大作问世，我也有幸能不断拜读、获益。此次这本大作积吴君多年潜心耕耘的结果，并赴英伦剑桥大学访学，对中英百年文学交往进行编年史式梳理、文学性叙述，史料齐全，文笔流畅，也尽可能吸收了海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对一些关系进行了相当程度的穷尽，这是一部学术性兼资料性的专著。

在百年中外文学交往中，中英文学交往无疑是其中的一朵奇葩，百年来两国文学家在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互相接受对方国度的影响，又对互相国度的文学加以影响，互相加以借鉴利用。不少作家远涉重洋来到互相国度，亲身学习领略传播互相国度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思想，丰富了各自国度的文学和文化，促进了彼此国度人民之间的了解。这其中的一些人物在中国和英国几乎家喻户晓，如辜鸿铭、严复、许地山、徐志摩、萧乾、田汉、杨宪益、范存忠、王佐良、老舍、叶君健、钱钟书等；如狄更生、笛福、罗素、萧伯纳、毛姆、燕卜苏、李约瑟、戴乃迭等。其中英国著名作家狄更生是一个酷爱中国的

人，曾说自己有两个文化理想：一个是希腊，另一个是中国，并说自己上辈子是个中国佬。他曾于上世纪初来到过这片令他神往的土地，并与伙伴们一起到了东岳泰山。当他们爬到山顶时已是黄昏时分，他们住在一座庙宇中，观赏月升日出，一种强烈的宗教神圣感油然而生。他曾写出著名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充满了对中国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抗战期间，奥顿和衣修武德两位英国著名作家也曾来到中国，以实际行动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写下了广为流传的《战地行》。几位英国文学大师的中国之行深深影响了中国一些文学青年的文学创作。而一部《赵氏孤儿》对英国戏剧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英文学文化既有差异，又有不少相似性，不同的文学观念在不同的社会中有其共同的东西。英国文学视域里有中国形象，中国文学语境里也有英国烙印。吴君的这本大作对此结合自己的研究进行了分析阐述、归纳整理，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把我们引进中英百年文学关系史这一文学殿堂。全书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文献包括手稿的基础上，视野开阔，论述精到，视点放在文学家“人本”，特别注意交流的双向性，中英作家之间的关系，以其渊博的知识，加以睿智的分析，令人读后不觉如游宝宫。

探讨百年中英关系史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吴君能对其有较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在其中游刃有余，弥补了其中一些不足，个中筌路蓝缕只有作者深知。

吴君多年来甘坐冷板凳，做学问心无旁骛，毫无浮躁流露，自然会得出不少真谛，也就有了这本“一介书生”之作。

中英文化与文学交流和互相影响源远流长，吴君只取了其中一个断面，希望吴君继续披荆斩棘，续写1949年后的中英文学交往史。

郝雁南

2010年5月

目 录

序一	曹山柯
序二	郝雁南
导言	1

第一部分 19 世纪后半叶时期

第一章 詹姆斯·理雅各与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 翻译	19
第二章 王韬——近代中英文化交流的民间使者	37
第三章 翟理斯在中文翻译与研究领域的贡献	53

第二部分 20 世纪初至 20 年代时期

第四章 亚瑟·魏礼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事业	65
第五章 狄更生对中国文明的乌托邦解读	86
第六章 罗素的中国行及其中国文明发展观悖论	93
第七章 严复、林纾和蒋瑞藻在翻译文学领域的 成就	111
第八章 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与拜伦诗歌的译介	125
第九章 周作人、田汉、郁达夫与王尔德译介	151
第十章 鲁迅、郭沫若与雪莱及其他英国诗人	161
第十一章 田汉与英国文学	172

第十二章	牛津的书虫——许地山与牛津大学·····	181
第十三章	英伦风范与徐志摩的理想追寻·····	185
第十四章	老舍在伦敦及其与英国文学的关系·····	229

第三部分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时期

第十五章	1933 年萧伯纳在上海·····	249
第十六章	E. R. 休斯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	261
第十七章	朱利安·贝尔与中国的文学情缘·····	269
第十八章	萧乾的英国文学机缘·····	291
第十九章	叶君健在英国的文学创作与交游·····	310

附录	剑桥的人文与人文的剑桥·····	318
----	------------------	-----

后记	·····	349
----	-------	-----

导 言

中英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开启了中英文学交流之门。虽然从 19 世纪初以来,西方传教士便开始进入中国,但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外国传教士即使进入中国也无法正常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观,以传教士为媒介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普遍开展起来。传教士把中国文学输入英国,带动了英国汉学研究的兴起,也引发了一些英国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他们有的来到中国,开展文学交流活动,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间生活之后,纷纷表达对中华文明的崇拜和赞美。与此同时,中国文学界通过英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文化输入活动以及一些近代中国翻译家创作的英国文学译文,开始逐步对英国文学产生兴趣。“五四”运动至三四十年代,一批钟情于英国文学的中国现代作家和学者赴英留学、生活、考察,他们有的在英国从事英文创作,把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情况以文学形式介绍给英国读者,赢得了英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有的回国之后致力于英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促进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内涵、促进其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纵观近现代百年中英文学关系史,其突出呈现三个特点:① 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询;② 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③ 新文化运动时期,英国文学在中国有选择地被大量译介。

一、英国学者和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主动探询

笔者认为,中英文学之间的交流之所以肇始于 1848 年,因为

是年传教士理雅各从故乡苏格兰重返香港,决心从事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以及中国文学研究工作。他认为要在中国做好传教工作,必须充分而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此后数十年,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协助下,他陆续完成了中国十三经的翻译工作,赢得了世界声誉。即使以今天汉学家的眼光看,这些译著的翻译质量在欧美尚无人超越。此外,理雅各撰写出版的多卷本《中国经典》、《法显行传》、《中国的宗教:儒教、道教与基督教的对比》和《中国编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汉学界占据了重要地位。他因此被聘为牛津大学第一位首席中文教授,与法国学者顾赛芬、德国学者卫礼贤并称汉籍欧译三大师,并成为朱利昂翻译奖的第一位获得者,其在世界汉学界的影响至今长盛不衰。理雅各在做这项工作过程中,可谓呕心沥血、耗资巨大,乃至身心俱损,疲惫不堪,但他锲而不舍,终于成为世界汉学史和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成为大师后的理雅各更加贴近普通读者,对于任何一封向他咨询中国文化的读者来信,他都认真回复,对问题详细阐述,有的回信长达数千字。这一点也令其他汉学家不可企及。

汉学之光不仅耀眼于牛津,在剑桥也熠熠生辉。继理雅各之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期的英国汉学领域迎来了赫伯特·翟理斯的时代。他曾于1867年至1891年间在英国驻华领事馆任职。在中国期间,他潜心从事汉语语言文学研究和翻译,著作成果达六十余种。1897年,他受聘于剑桥大学,继托玛斯·威妥玛爵士后担任该校第二任中文教授直至1928年。1900年前,翟理斯主要翻译中国诗歌,他的译文采用传统英文格律诗的形式,韵律工整,句法严谨,符合那个时代英国读者的审美趣味,从而“极大地激发了英国人对中国诗歌的兴趣”。他译《三字经》,译文依然采用英文格律诗形式。他还译出了《聊斋志异》、《老子》、《庄子》,编译了《中国文学粹珍》。1897年,即翟理斯担任剑桥大学中文教授的当年,他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史》。1900年后,

他着力于理论研究,陆续发表了《19 世纪的儒学》、《中国神话故事》、《中国古代宗教》、《中国绘画艺术导论》和《中国文学题材论文集》等论著,他还为《大英百科全书》撰写了《中国的艺术、语言、文学和宗教》和《中国文明》的条目,这些作品不仅一次次点燃了英国读者对中国古代艺术和儒家思想的探究热情,也为英国汉学研究的理论拓展开辟了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代,英国再次迎来文学史上的一个伟大时期。这是乔伊斯、艾略特、庞得、劳伦斯、温德汉·刘易斯和立顿·斯恰奇的时期,也是布卢伯里学派的时期,同样还是阿诺德·拜内特和萨默赛·毛姆的时期。战争的残酷使西方世界对自己的文明产生了失望和失落的情绪。英国的文学界正是在这种情绪中悄然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读者关注异域情调,于是他们从古典的西方文明转向古代的东方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毕业于剑桥大学同时熟悉英国文学界顶尖作家的著名诗人魏礼逐渐成为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文学人物。他自学汉语,达到精通的程度,目的是为了创作出让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普通读者也能够喜欢和接受的汉诗译文。他所选择翻译的诗歌大多内容具体,语言简明优美,意思明白易懂,英国人不需要注释就可以理解领悟。

魏礼一生没有去过中国而且刻意拒绝去那里,因为他害怕他心目中凭借诗歌建立起来的古老中国的印象遭到破坏。他的作品充满神奇和神秘的东方情调,而这种异国情调能够让爱好文学的英国人理解并产生兴趣,其作品因此获得了文学与社会的双重价值。从 1916 年到 1964 年期间,魏礼出版了大约 40 部著作,发表了 130 多篇文章,其中包括翻译的中国、日本文学作品和他写的散文和诗歌等,许多译本多次印刷,发行数量庞大,有的流传广泛、经久不衰,譬如《中国诗歌集》、《中国诗歌 170 首》、《中国诗歌译文集增编》、《诗经》以及与赫伯特·翟里斯合作翻译的《英译中国诗歌选》等;还包括《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儒家思想和中庸美

德》、《孟子详解》和《论陶潜的诗》等一批理论性研究著作。魏礼在汉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他独有的中西文学观和中国诗歌翻译思想，他擅长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对汉诗进行评价，虽带有浓厚的西方主义色彩，但这些异域视角下产生的观点有值得我们思考之处。譬如中国诗歌讲究用典，倚重模仿套用前朝诗歌名句，魏礼对此很不理解，反感甚至批判。魏礼对中国诗歌创作所提出的质疑，是异质文化间的审美差异问题，值得中外诗歌研究者进行深入研究讨论。

剑桥大学研究员高斯华绥·狄更生是值得提及的汉学家。狄更生“在 1907 年的时候把中国带进了亚瑟·魏礼的视野”，在 1920 年时把徐志摩介绍到剑桥大学研究文学，而且他对中国文明颇有研究。狄更生天生喜欢中国，自认为前世一定是中国人，并对中国文明寄予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他曾两次来中国游历，强化了原有的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他撰有《中国人约翰的来信》和《论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表达了他对东方文明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儒家思想的内涵是理性主义、怀疑主义和对行为的关注，这真正体现了中国人“以人为本”的精神。他称赞儒家文化犹如中国上空悬挂着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如果中国是个宇宙，那么人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他提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诗歌和艺术具有较为完美的人性化精神内涵，这值得罗马人和英国人学习，后者缺乏这种美学天赋；中国绘画艺术把自然看作一种完美对象，具有内在的真实性，不断被清醒而敏锐的人类灵魂思考着，这点迥异于威尼斯和印度艺术家的风格；中国的诗和画乃是异曲同工。基于此，狄更生认为，中国诗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上最人性化的诗歌，丝毫不带有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神秘性和抽象性痕迹。狄更生关于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人本主义观念，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反思意义。是滥用西方理论，还是站在西方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艺术缺失的角度审视我们的文学创作传统，不是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吗？

上世纪 20 年代到过中国的英国学者还有哲学家罗素，他曾在北京大学讲学数月，在北大师生中引起“罗素热”，其哲学思想受到热捧。但罗素到中国的目的不是讲学，而是探索中国文明之于西方文明的疗救作用。他说，1920 年在伏尔加河畔，他突然深刻地意识到，西方已经在精神上病人膏肓，西方列强在以后的几百年里很有可能会自相残杀，导致自我毁灭。他感到西方文明的前途是绝望，他说：“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我出发到中国去寻找新的希望。”罗素回国后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该书立足中西文明的差异对西方的前途进行思考，他从关心中西方命运的立场出发，希望中国传统文明成为欧洲人民心目中的一座道德丰碑，欧洲文明能够在此丰碑的荫庇下继续其文明发展道路。他指出：“当我在中国时，我是在教书，但是我每天所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向中国人学习，而不是如何教他们。我发现这种态度在那些久居中国的欧洲人当中并非罕见……我希望中国学习我们的科技知识，而她则回馈我们她的博大宽容和深邃宁静的思想。”罗素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者，他批判是为了建构，为此他求助古老的中华文明。他在九十年前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我们至今仍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中国文化如何对世界发展和人类前途做出贡献？

上世纪 30 年代有两位英国人与中国文学发生过密切关系——汉学家 E. R. 休斯和诗人朱利安·贝尔。休斯于 1911 年作为传教士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 23 年，回国后成为牛津大学中国宗教与哲学教授。同许多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一样，他认为要了解中国，不能不学习中国的文学艺术，而了解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变迁，不能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状况。为此他专门著书介绍中国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在 1937 年出版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入侵》一书中，休斯着力澄清西方对中国文学的误解，认为长期以来，由于翻译到西方的中国书籍以古典文学经

典为主,这使得西方学术界普遍以为中国文学只意味着有限的几本古典经书。休斯指出,中国文学之卷帙浩繁,中国文学之优美精深,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他介绍了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冰心、巴金、茅盾、田汉等十几名中国现代文学界的杰出作家。休斯把“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运动”。他认为,新文化运动不完全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开展的文学革命,他特别提到了蔡元培、胡适和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以及对他们作为文学改革者所具备的“道德勇气”表示敬佩。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足以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进步。他指出,西方知识并不是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良药,“中国从西方获得最初的启发,西方给他们提供词语以及最为关键的进化论理念。但同时文学必须清醒地看到,他们的驱动力来自中国的内在传统以及中国自身的实际需要”。可见,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休斯没有用殖民主义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他更像一个具有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学者。他让西方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灿烂辉煌的面貌及其发展壮大的自身潜能。

诗人朱利安·贝尔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他讲授英文写作和莎士比亚,开设英国现代派文学讲座。他的学生中,有著名翻译家、作家叶君健。当时的文学学院院长陈源的夫人、诗人凌叔华喜欢英国文学,经常到贝尔的课堂上听有关莎士比亚和现代文学的讲座,而贝尔则把凌叔华短篇小说的英文翻译寄给他的英国朋友。贝尔还把凌叔华介绍给了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一直对东方——尤其中国——充满奇异的艺术想象。贝尔在西班牙阵亡后,凌叔华和伍尔芙都陷入悲伤之中。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战的艰苦时期,英国也面临着德国法西斯的空中侵略,这使得两个处于不同国度的女作家有了更多共同牵挂的话题。她们那时的通信更多地谈到战争以及战争给自己和世人所带来的伤痛。凌叔华移居英国后,在伍尔芙的鼓励下,曾写了一部

英文小说《古韵》(*Ancient Melodies*)。小说通过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的眼睛展现了清末中国旧式大家庭的日常生活和人情是非。1953年《古韵》由伍尔芙夫妇创办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英语世界的畅销书,好评如潮。

20世纪30年代萧伯纳访问上海,这是中英文学关系史上一桩颇有影响的事情。1933年2月,萧伯纳来华游历,他先到香港,然后于2月17日抵达上海。在不到一天的短暂停留中,他与当时上海的政治、文艺和新闻界的一些头面人士——包括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梅兰芳、邵洵美等进行会晤交流。萧伯纳此次来上海时间虽然不长,影响却很大,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形容,就是“伯纳·萧一到上海,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厉害,不必说毕力涅克(Boris Pilniak)和穆杭(Paul Morand)了”。各种媒体针对他的文学态度和政治立场发表了大量或褒扬或反对或嘲讽的社论。瞿秋白和鲁迅先生在萧伯纳访问上海期间,他们对此事给予极大关注,尤其非常关心当时新闻界对萧伯纳的种种评论,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看法,对一些报纸不负责任攻击谩骂萧伯纳进行了有力回击,表现出对萧伯纳的大力支持。鲁迅对萧伯纳的记述,见于他的1933年的散文《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和《颂萧》中。萧伯纳上海之行虽然时间短暂,但其大文豪的身份和敏感的政治态度却产生了飓风式的效果,大量的五花八门的关于萧伯纳的评论集中爆发,而当时中国众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矛盾在各类文人对萧伯纳的态度中凸显出来了。这是一般情况下文学研究很难再现的效果。

二、中国作家在英国开展文学创作与交流活动

20世纪20年代以来,远赴英国工作、留学、生活并从事中英文学交流活动的中国作家不在少数。徐志摩是中英文学家交往的

典范。1920年9月他从美国来到伦敦,后去剑桥。在留学剑桥期间,他交游广泛,结识了不少英国作家和学者,包括威尔斯、哈代、曼斯菲尔德等一些世界级著名作家。剑桥是一座山灵水秀的大学城,荟萃了人文和自然灵光,成为徐志摩一生文学创作和思想变化的重要转折点。徐志摩在剑桥爱上文学并开始写诗,其剑桥诗篇在我国家喻户晓。

徐志摩一生崇拜两名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和凯瑟琳·曼斯菲尔德。1922年7月,徐志摩在伦敦会见了曼斯菲尔德。此次谋面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却给徐志摩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国后他翻译过不少英国作家作品,但是唯独对于曼斯菲尔德情有独钟,他说:“除了曼殊菲儿是我的溺爱,其余的都算是偶成的译作。”徐志摩一直以来就对哈代的作品颇感兴趣,1924年,他曾翻译了哈代的许多诗歌。在英国期间他与哈代也曾有一面之交。1925年7月,徐志摩赴英国参加为印度诗人泰戈尔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并和哈代会面。给徐志摩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哈代的容貌,这个大文豪的脸部表情使徐志摩读懂了哈代的灵魂,更深刻理解了他的作品内涵。

徐志摩与曼斯菲尔德和哈代的会面虽然算不得正式的采访或访谈,也没有详细的会谈记录,但它们对徐志摩心灵的震撼和启发却通过他后来的文字清晰而浓烈地展示出来。而最重要的是,徐志摩通过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不能仅仅依靠标签去认识一个作家。因为一旦给作家贴上固定的标签,譬如对于哈代,其涵义就好像哈代成心当一个悲观厌世的作家似的,仿佛他的创作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他的悲观。此外,读者和研究者也不可以顺水推舟地接受别人给作家的那个标签,一定要亲自探索和研究哈代是否是悲观的。徐志摩与哈代谋面正是出于这个“亲自探索”的目的。而那次谋面确实令徐志摩产生了不同感受。按照徐志摩的描述,虽然哈代的表情正如他的作品一样充满凝重的忧郁和感伤,但它也